

【文化人类学】

遗产政治学：现代语境中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

彭兆荣

(厦门大学 民族学与人类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0)

摘 要：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财产”，与社会、历史、自然、文化、表述方式等存在着复杂的关系。对它的认识、理解、诠释呈现诸多的差异与变化。在当今“遗产热”的运动中，由于强烈政治话语的作用，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打上了政治学的深深烙印，出现明显的“倒置现象”——无论从定义和分类、对遗产的认知抑或是遗产主体性“失语”甚至“沦落”，都亟需辨识与澄清。这不仅关乎人们对遗产认识的清晰性和选择的理性，关乎人类对自我家园重建的自觉性和重要性；也关乎我国政府制定的遗产战略“可持续性发展”的效益与效果。

关键词：遗产；政治话语；表述的主体性；认知；家园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867X(2008)02-0005-10

一、拷问遗产

1972年 11月 16日，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了一项世界性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公约开宗明义，对“文化和自然遗产的定义”解说如下：第 1条，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文化遗产”：文物。第 2条，在本公约中，以下各项为“自然遗产”：从审美或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划为受威胁的动物和植物生境区；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区域。^[1]

从人类学的知识谱系和研究角度来看，遗产与亲属制度，特别是继嗣原则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根据某一个特定的继承关系从祖先那里获得遗留下的财产和权利。^[2]这一原初性的概念至少包括三个要件：1. 遗留物。主要指人们所理解、所认同的，由上辈留下的财产（传统社会为约定俗成，现代社会由法律加以规范）。2. 继承原则。指由某一个特定的民族、部族、宗族、家族等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里所形成的确认性继承方式。3. 遗产的继承者在获得继承权的同时被赋予相应的责任和义务。简言之，遗产就是一种继承关系。由于遗产形态的多样性，人们通常在思考继承物或遗产时会有更宽

泛的理解；比如从形态上看，“遗产”可分为“物质性的”（过去传承与延续下来的某种物质形态，如环境、财产、物品、钱财之类）；“非物质性的”（诸如记忆、姓名、友谊、故事、特权、家风家法、某种成员资格、权利等）和“象征性的”（任何凝聚在某一个特殊和特定的人群、集团、宗族、阶级等范围内具有确定和确认价值的符号——包括物质的和非物质的，如传统的权威组织与结构等）。形态的划分并不具备严格的边界限制，它们之间存在重叠。重要的是遗产与相应的文化形貌形成一个整体，互证互疏。同时，通过“遗产实体”进行知识传承也构成遗产关系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部分。^[3]

逻辑上说，自从有了人类，“遗产”便已存在，并成为人类文明长时段传统的纽带。然而，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 1972年颁布的《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这一历史事件，各类遗产分类、评估以及保护措施等陆续进入到国际性的立法程序。毫无疑问，这种由联合国制定公约，各国政府制度政策法规，各地行政机关主持实施的“运动”，对于保证“遗产工程”的顺利进行，提升人民保护遗产的意识等都有明显的效果。然而，这一切又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

不言而喻，在当今“遗产政治学”的语境里，遗产的政治语义迅速膨胀，阶级、社会等级、权力以及民族主义都卷入了遗产的表述、再表述与被表

【收稿日期】 2007-12-25

【作者简介】 彭兆荣（1956-），男，四川大学 985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基地特聘教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述之中。^[4]对“遗产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并引发了一系列问题。从国际学术界的批评角度来看,遗产研究不仅对概念、定义进行多角度阐释,在认识、理解遗产上拓展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也对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相关机构、遗产保护协议、遗产运动中强烈的政治化倾向进行了批评。这有助人们进行遗产研究时不至于在认识上产生民族主义的狭隘性,也不至于将“遗产学”简单理解、牵强附会于某一个国际组织公约中概念,或等同于某个国家和政府法令、法规,更不至于削足适履地服从于行政命令和管理方式。鉴此,开展对“遗产运动”的批评不仅必要,而且必须。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的“定义”(分类)非常清晰、具体,这有一个好处:便于各国政府进行相关的保护性立法;也便于进行遗产的保护性开发和利用。然而,正因为此,可能在现实中制定政策、进行评估和具体实施等方面出现“模式化”倾向。这与遗产本身的价值产生背离;理念上存在着矛盾和悖论。众所周知,能够称得上“世界遗产”称号的必须具备不可替代的、不可再生的、独一无二的品质。这些特性决定了我们要根据每一个遗产的特点进行专项的调查、评估、分析、研究和保护,包括对某一个遗产特殊性的正确理解、适用方法等。这也是学术界所诟病的所谓“遗产工业”,即以一套标准化的、数量化的、技术化的、模式化的、法规化的、行政化的“流水线”作业,以操作程序相似和相同的手段对待遗产。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时间里,遗产的创造将一直伴随工业的成长。”^[5]其后果是:遗产存续将留下“标准化痕迹”。

2. 处理遗产与商业之间协调平衡方面的偏差。在现代社会,经济和商业的作用无人低估;但如果在经济利益与遗产保护之间发生冲突时,我们当然要强调以保护遗产传统价值为先的原则。然而,多数国际组织的公约和文件中并没有旗帜鲜明地确立这样的原则,从而加剧了遗产地为申报和争取进入“世界遗产名录”过程中各种不同力量的代表、不同利益的集团之间的紧张感和竞争性。^[6]这种紧张感和竞争关系主要由经济和商业利益所驱动。世界上许多案例都证明了这一点。许多地方为了争夺同一个“遗产资源”,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以极强的功利性地去解释,甚至不惜杜撰、编造历史。事实上,遗产战略与经济、商业并非不能相互推进。遗产之于现代经济社会具有非凡的能量和能

动作用;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考验着人类的智慧。目前仍缺乏有效的平衡机制,造成实践中的两种倾向:1)尽可能排除、淡化现代资本、商业、经济因素对遗产的作用;2)强化现代资本、商业、经济因素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诸如“制造遗产”、“遗产创造”、“建构遗产”等事例。笔者认为,公益性遗产保护、利用的制度和措施无疑是一种良性选择。

3. 对遗产的代表性认识存在一个明显的特征,即过分强调遗产的现代价值和意义,对遗产在发生与发展中所表现出的地缘性和历史原因缺乏全面认识。虽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相关文件和官方网站中有这方面的强调,^[7]但在功能性操作、制订法规等方面的浓墨重彩中,这些最重要的特质时常被遮盖。遗产是一个“现成物”,是为不争。对于这一个事实,人们必须保护它、利用它。这在所有的遗产公约、遗产概念、遗产立法中都得到充分的体现。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作为遗物,遗产在与人类历史的存续关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8]它首先表现为一种“历史态”,属于历史时态的延续纽带;至少包括“过去时”+“过去完成时”+“现在进行时”+“将来时”。而现行的遗产政策对于“遗产”之所以成为遗产的内在逻辑、历史过程、联系纽带、地缘知识等强调不够,过于突显遗产的“现在时”价值。所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着眼于遗产的可利用价值。

4. 世界上许多著名遗产都与人们对它的认知、审美和崇敬有关。有些遗产之所以得以遗存,是因为被人们视为“图腾”、“圣物”、“灵迹”等。有些属于生态伦理与自然宗教的“公义”。^[9]本质上说,遗产是“自然的”,也是“文化的”。“文化/自然”在认知上属于一个“二元关系”之整体。^[4]任何遗产的认定都离不开人们的认知与审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遗产作泾渭分明的区分恰恰破坏了“自然-文化”浑然一体的表现与认知关系。一座山成为“名山”,成为自然遗产,主要原因并非其地形、地貌,而是“从审美或科学角度”体认的结果。它需要人类精神的附会,人类情感的渗透,人类审美的参与,人类认知的实践。

5. 遗产作为“公共资源”的政治价值与遗产在学术研究中的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表现在:1)“在实践中,遗产的定义是我们文化中利益冲突的产物,而遗产的真正意义有赖于对其进行可索解、可判别的文化批评工作。”^[12]也可以说,遗产

的现实价值可能表现为不同利益关系的政治平衡，甚至包括每一个国家在争取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提名额度的限制性。这种机制貌似在不同的国家之间寻求“公平原则”，恰恰违背了遗产本身应该享有的公正待遇。而遗产学研究则侧重在不同的“文化谱系”中寻求人类遗产的独特价值。2) 在许多情况下，对遗产的阐释、理解与遗产的开发、利用之间存在着“倒置现象”：一方面强调遗产具有审美的、历史的、人种学的、人类学的所谓“突出的普世价值”；另一方面对某些具体的遗产却经常在未展开充分的科学调查、研究和评估的情况下，开发和利用计划已经诉诸实践。这种现象在我国尤为严重，必须引起警示和警惕。

6. 遗产附丽了时代、政治、权力化的“附加值”。“权力”具有各式各样的表述范畴和表现方式，形成了特殊“遗产语境”中的“话语”强势。这种带有政治性的“遗产叙事”在不同的背景下引领着不同的表述方向。^[10]而政治引领与遗产本身所展示的意义、指喻和作用并不一致，有时相互抵牾。由于当代社会对遗产的目标带有实践性质，具有利益的相关性，有的时候它不得不成为利益关系的计量物，甚至牺牲品。因为它时常成为某种政治权力“被劫持的符号”。^[11]遗产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政治风云的“晴雨计”作用；“政治变迁会迅速反映在遗产语境里”。^[12]人们可以透过它洞识政治脉络和走向。

7. 遗产运动的政治性隐喻直接推导出另一个后果：遗产转化为考查各级行政部门“业绩”的标志之一。换言之，遗产成为行政部门通过行政操控、行政法规、行政管理、行政手段等实现“绩效”以兑换政治资本的变相“公式”。在这一过程中，大规模的群众旅游为各级政府实现行政绩效注入了巨大能量；因为“遗产旅游”是一个风向标。诚如学者所说：“旅游成为引导遗产行进的旗舰”；“遗产叙事是一种为了旅游目的而被选择的特殊表述方式”。^[12]反过来，旅游又强化了行政事业的重要性的管理方面的成就感。^[13]行政管理把遗产变成一种品牌，而“遗产品牌工程”的实施又加剧了行政权力的运用。我们无意介入类似的政治游戏规则，任何事物一旦进入到操作程序，便受到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所约束。我们想强调的是：一俟行政力量主导“遗产工程”，遗产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改变了原有的特性，其命运便与行政化的政治效力联系在了一起。

8. 遗产的概念与“遗产工业”并置甚至交融成为现代技术主义的一大特征。二者可以各自独立，却无法完全“排他”。我们给遗产下定义，从理性和理论上讲，应该是就遗产本身而论“遗产”。可是在后现代的社会语境之下的任何“言说”都已经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而后现代的“遗产说”融铸了浓厚的“遗产制造技术”的成分。现代技术主义超越了技术的樊篱，不仅改变着人们工作、生活的习惯，而且正在改变人们的认知体系和思维方式。当技术主义与社会再生产相结合变成“遗产工业”的时候，遗产便不可避免地出现异化。二者的并存与“共生”最具讽刺意味的恰恰源自于二者的相处：“遗产的危险正好来自于遗产工业”。^[12]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在当下所说的“遗产”便是技术主义的“产物”，其根源来自于相同的“技术-官僚主义的组织结构”。^[14]现代技术主义强化了现代遗产工业的话语特征。简言之，现代技术与现代政治的共谋。

9. 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发生了“分离-倒错”现象。具体地说，遗产的主体，即遗产的创造者与“发明者”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成为代表遗产“发声”的主体，却经常处于对“自己的财产”丧失发言权的情状之中。从逻辑上看，对于遗产的处置权首先来自于遗产的创造者和传袭者，二者构成了继承、权利、责任和义务连带关系的表述主体。当然，遗产的主体性可以是多样的和复杂的。首先表现为“个体（部分）-集体（全体）”之间的认同关系：一方面，遗产属于“民族”和“集体”；另一方面，又是“个人性的”，^[14]所以，对遗产最有处置权的理应是既代表族群又反映个人意愿的人群共同体。法国人类学家巴松探寻了“patrimoine”（英语里通常翻译为“遗产”）这个法语词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是怎样从亲属继承制的个人合法权利移交到民族或遗产政治手上^[15]的变化轨迹，反映出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的历史变迁以及遗产叙事主体的分离与转换。在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政治权力成了名副其实的“遗产”的代言人。而代言理由的正当性正是来自民族-国家权力和集体主义。于是，“越俎代庖”的言说关系便名正言顺。

10. 遗产的“形象”（image）与“想象”（imagined）形成了一个重叠与背反的关系。遗产的意义在最近二、三十年内骤然扩大，可以解释为一种“想象”的结果。遗产的表述与被表述关系属

于建构性的“区分/排斥”关系。由于遗产是一笔巨大的“象征财产”，必定引起“他者”的兴趣，正如亲属关系与家庭一样，形成遗产的“我者”认同与“他者”归属的形态关系。^[16]很清楚，遗产运动之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段被选择，而不在“文革”期间，一方面说明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变；另一方面，也来自诸多“他者”因素，包括国际社会的作用、树立“国家形象”的需要、地方政治的考评、大众旅游的推动等综合性力量。“遗产形象”充其量只不过是这种综合力量的“被表述的符号”。遗产形象的这种“被装饰性”仿佛一个全能的演员，在变幻的舞台上不断被改换新妆，在不同的背景下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遗产的“真实性”遂成遗产研究关注的重要问题。^[4]

二、认知遗产

遗产的重要特征在于其样态、品质、属性以及人们对它的认知的独特性和多样性。这与创造和产生遗产背景的差异性有关，也与反映在遗产中的关系和对遗产的认知有关。人类认知的独特与多样必然会全貌性地反映在遗产之中。

任何一个文化与自然遗产，归根结蒂都属于人类智慧（包括审美活动）和劳动的结晶。“作为全人类世界遗产的一部分”为全人类所共享，^[11]所以必须得到有效的保护。基于上述原则，有些原先属于某一个家族（如封建社会的皇家宫殿、陵墓）、教派（如一些教会的教堂）等“世界遗产遗址”，在“保护人类文明遗产”的前提下，那些对遗产拥有继承权的个人、家族或团体，以转移、交换、捐赠、被剥夺等形式将私人或家族的继承权移交、转移给了国际组织或机构监管。在这种“产权变更”的过程中，个体或群体的归属性——“自己的财产”转变成为人类的共有财产，——“我们的遗产”。^[3]这个“转换”和“变更”过程无疑与人类认知过程、认知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人类如何正确认识和理解遗产的“个性/共性”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遗产的命运。格利尔将遗产描述为“特殊的文化表述使我们成为‘我们’，——即我们的DNA”。^[17]众所周知，任何文化的表述都脱离不了基本的族群单位。每一个族群对“我们的文化”都有相对一致性的认定，以便区别于“他者的文化”，这便是人类学族群认同之边界理论的核心。巴斯认为：“民族确认的最重要价值与族群内部相关的一些活动联系在一起，

而建立其上的社会组织同样受到来自族群内部活动的限制。另一方面，复合的多族群系统，其价值也是建立在多种族群不同的社会活动之上。”^[18]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文化”不具备个性特征和自我负责的能力。相反，越是在与不同族群关系的“边界”修建中越有利于强化某一个族群的认同。道理很简单，文化的确认终究要由某一族群根据自己的族源和背景自己来确认。它融入了某一民族或族群意识，是一种族性认同的叙事策略，以凸显其“自我认同”的专属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将遗产表述视为一种文化认同。“遗产的理念包含了有关我们过去的知识和表述，以确定文化认同在未来发展的样式。”^[19]

每个遗产都属于某一个特定族群的集体表述与历史记忆，是从“过去”到“现在”再往“将来”的联接纽带。^[19]雅卢里以希腊的卫城为例，认为它是希腊民族认同的聚像形式和情感的粘合剂；所以，“研究具有纪念意义的遗址必须与它的时间与记忆联系起来”。^[20]遗产属于“选择性的历史记忆”。^[4]它帮助人们追忆往昔的光荣和荣耀，强化历史的自豪感；特别是在传媒神话的今天，现代传媒将这种历史记忆加以凸显、张扬、强化甚至夸张。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没有被选择的遗产便属于被遗忘或被暂时遗忘的部分，而且是绝大部分。这种刻意“记忆/忘却”的目的性和倾向性又揉合了现代社会的商品意识，成为被争夺和盗用的东西。“遗产属于一类地方性资源，因而是一种认同”，其中“民族的、地方的、甚至个体的认同”都可以转变、转化、转形为确认遗产的依据，^[2]成为特定地缘群集体认知价值的体现。显而易见，没有这种表述与记忆便失去了“自我”，消弭了认同。没有它，任何遗产在时间上便失去了发生与存续的理由。因此，在遗产研究领域，对“过去”的表述、记忆和传承也就包含着个人的、社会的和政治的等多方面意义。集体表述与记忆并不是一个隐喻，而是一个社会遗存；它通过群体意识的展示，组织机构的保障等来维持社会现实。“记忆属于个体和集体认同基本的构成要素，今天它已经成为个人与社会联系的一种必须的、不可不为的基本行为和活动。”^[21]更有意思的是，对遗产的记忆与认同甚至关系到所属人群的身心健康。有研究表明，文化遗产是老年人自我认同的基本要素，在治疗老年痴呆症方面——即通过他们对文化遗产的记忆以唤起他们在记忆与思维等方面的能力，具有特殊的疗

效。^[22]可见遗产的记忆与认同功能非同一般。

既然遗产属于特殊的存留物或存留样态，也决定了其相应的地方和空间背景。《世界遗产名录》在这方面的规定包括：1) 相同的历史 - 文化组成。2) 在地理区域特征内的相同类型的遗产。3) 相同地质形态构成，相同生物地理省份或相同生态系统类型并说明其作为一个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系列遗产不能将其分割开。^[1]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遗产的地缘生态，正如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阐述的那样，它是乡土社会的基层单位，是“面对面的社群”，是“生于斯死于斯”的地方，是民众的生存之本和“命根”。^[23]它不仅表达了地缘性人群共同体特殊的“遗产情感”，而且是“我们可以看得见”的依据，是“土地之上”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景观。人们通过“看得见”的遗产与“看不见”的情感联接起关系纽带。^[24]因此，尊重遗产的地方性主体价值方为遗产战略之根本。然而，由于传统的农业伦理衍生出的“家国天下”的帝国政治影响，国家与地方的“二元关系”在权力格局中经常出现失衡状态。其原因在于：地方政治的基础表现为契约性“同意权力”；而国家的政治基础表现为专制性“横暴权力”。^[23]这样的权力关系时常导致遗产政治的两种负面效应：1) 地方民众把遗产当作小团体、小范围既定的契约性“私有财产”任意处置。2) “横暴权力”的放任与滥用，对遗产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有时政治运动直接造成对遗产的破坏作用。“文化大革命”便是一个例子。其后果是：遗产的公共性被任意地扩大，而所属性却被缩小或被遮蔽。“我们必须努力使自己从某一个遗产的‘幻像’中解脱出来，这一遗产幻像正是被公共的、无地方性的公权利所制造。”^[25]因此，遗产的政治公权利同样需要受到制约。

严格意义上的“遗产”可以被认为是自然环境的生态性遗物、遗存和遗留。逻辑性的、任何值得保护的遗产也都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典范。必须认识到“世界遗产是一种脆弱的、不可修复（不可再生）的资源，必须受到保护，以保持它的真实性并留给后人享用。”^[26]如果生存环境受到破坏，遗产便丧失了存在的环境和物质前提。

遗产政治学涉及到复杂的国际关系，“文化和自然遗产的所在国的主权，并在不使国家立法规定的财产权受到损害的同时”，也“承认这类遗产是世界遗产的一部分，因此，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合

作予以保护。”^[1]（《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2004：5）如果某个国家发生对其主权所属领土范围内的遗产的破坏行为和事件，整个国际社会可以对可能发生的后果，或已经发生的严重后果有所作为。从当今国际舞台上公认的惯例来看，民族国家是基本的表述单位，是遗产的最高合法性代表。国家在行使其政治权力时必须意识到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本身的“想象性”、“有限性”和“主权性”。^[27]（安德森，2000：10 - 11.）在对待人类遗产的问题上，任何民族国家都可能发生破坏和践踏遗产的后果，所以需要国际社会力量的督促和制约。

如上所述，全球范围内有关遗产的主导价值来自于联合国；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遗产政治中所隐含的某些殖民化因子。具体而言，全球背景下所推行的“遗产政治”仍然带有“欧洲中心”和“工业历史”的强烈隐喻。只要我们对西方现代史作一个大致的梳理，便不难看出这种判断的历史依据。20世纪60年代以降，西方社会一直鼓励对自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现代工业、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文明形态所起的主导价值的作用进行总结。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保护“物质遗产”也就成为一种张扬西方工业革命所引导的历史成就和物质成果。简言之，鼓励对物质遗产进行历史研究和总结与所谓的工业，或以工业为主的文明主题有关。^[28]在这股潮流的作用下，60年代以后，西方的主要国家便出现了对遗物历史的兴趣与热情，许多机构相继成立“人类遗产”的“重组”与“西方中心”的政治叙事不可须臾分开。^[28]这一“政治叙事”后来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更大的“官方话语”表现出来。我们之所以不能漠视这一段历史的发生与发展，一方面不能轻视西方发达国家对人类“物质遗产”，包括工业技术主义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先导作用。同时，它也引起我们对这一短暂的历史之于当下所进行“遗产政治”价值引导的关键性的重视。这对我们理解“突如奇来的遗产运动”颇有助益；也有助于我们更自觉地分清“自己的遗产”的自主价值，避免使之沦为“他者的陪衬”。当遗产成为现代旅游的一个资源性品牌和品名的时候，要格外警惕遗产演变成某种“新殖民主义”副产品。^[10]

毫无疑问，人类的所有观念和行为都要受到某一个时代和社会价值的制约，人类遗产也不例外，它既是“传统的发明”，^[29]也是“传统的制造”。

人类遗产之所以在近 50 年陡然“升温”，与其说是人类认识上的提高，毋宁说是现代性或后现代性语境中被动思维的产物。有的学者称之为“后现代主义遗产”(post-modernist heritage)，^[11]并构成后现代主义的社会景观。在这样的背景和“产业化的生产模式”的推动下，一方面，“文化遗产已经变成了一种赚钱的商业，这使得在过去曾经出现过、发生过(对遗产的破坏性事件和行为)社会风气有可能回潮。”^[19]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再生产“需求”使提高了遗产的可“消费”性。格拉本教授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时用了个值得人们深思的篇名：“学会消费：什么是遗产与何时成为传统？”^[3]“消费”与其说是行为，还不如说是观念性认知。

当遗产被涂上现代社会的商业色彩，进入社会再生产的操作程序，变成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立法、行政的商议和实践对象时，遗产便很难真正成为“发声”的主体。一旦社会需要通过政治权力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对遗产的认识和保护价值时，遗产已经成为一个“被表述”的工具。令我们同样担忧的是，政治权力和商业利益还会产生出制造遗产赝品的情热。^[11]“产品提供消费，表现在遗产上的商业权力在许多方面加速和加剧了‘竞争性’。”^[21]每一个机构、组织和商业团体也在同一个符号目标上形成了竞争关系。遗产便可能成为一个多方共同“获取猎物”的符号选择，^[11]造成表面上大家合力做一件事情假象，结果却在进行拆解和拆卸工作。

相对而言，遗产主体处于“失语”状态的现象应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遗产经常被贴上的标签成为经济对象和政治选择的一件件“专卖品”；对此我们虽然无法根本改变现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无所作为。比方我们更“关心遗产的感受”，^[30]更尊重创造和保护那些文化-自然遗产的主体，更尊重那些遗产原创者和所属者的权利和意愿。这种“换位”思维的一个逻辑前提符合遗产属于特殊的认知和表述，尤其是那些与众不同的文化遗产以及“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们的存在价值在很大程度上直接来源于特定的原住民认知系统。这一切不仅有助于确立所谓独一无二的“文化物种”属性，也构成区分“我们/他们”的边界和差异。所以，尊重和分享不同的遗产，等于尊重和分享不同族群的认知体系。反之，那些创造和分享自己文化遗产的族群和民众也要提高自己的认

识：不可以轻易丢失他们赖以据的“文化标识”；丢失了它们就等于丢失了自我。

三、家园遗产

迄今为止，由传统社会传承下来的生存与生活方式仍然是地方性“家园共同体”。德菲尔德列举了四种“共同体”的基础要素：小规模社群，共同体内部成员思想和行为所具有的同质性，对相同价值的认知与认同，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的自给自足。^[31]有的学者概括为三个特点：人群的共同利益，人群生活的同一个环境和地方，相同的社会体系和结构。有的则突出共同体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功能与结构。有的侧重于一个人群共同体内部的情感归属与认同价值。有的强调社会组织与自然生态的相互平衡、调节功能及各种关系等。^[32]简言之，特定区域的地缘性不可或缺。它是同一个人群生活在一起的物质基础。人们只有共同在一个地方(土地)上生存、生活和生产，才谈到上其他方面的共同特点、共同利益、共同情感和共同目标。^[33]我们强调“家园共同体”的重要性，因为它是人类遗产的根本；而每一个遗产所具有特殊的“指纹”必然来自同一家园共同体的“遗传因素”。如果人类遗产丧失了地方性的家园纽带，也就等于失去了文化原初性和归属感。对于现实中的人们，家与家园是他们某一个“地方”的锚地和港湾。^[4]

民族志对地方的反思性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 就人类学学科的知识谱系而言，“地方”不啻为民族志田野作业的“标签”。人类学“是存在于不同地域的文化差异的移入促使人类学成为一门地域性科学。”^[34]2. “地方”包含两个相应的身份确认和关系对象。对人类学家而言，田野中的“地方”属于进入、观察、了解和解释的“他地”，而“家”则是人类学家自己所熟悉的母体文体的属地。“田野”和“家乡”的区别在于两者的时空分离和“主位/客位”的分隔。3. 民族志研究将“他地”(异文化)当作“我者”之镜以建立“我者/他者”关系，并延伸出“区分/排斥”的文化结构。4. 地理上的方位和位置仅仅构成表面上可量化的社区；人类学家对地方研究所擅长者主要并不在地理社区方面，而是对一个具体地点研究的“非地方性”、“再地方性”或“地方性解构”，——这些新的解释性意见虽然在意义上不完全相同，但都传达了一个基本的意义，即通过地方案例和榜样取得“非地方”(超越某一个具体区

域)的解释。正如格尔兹所说:“人类学家并非研究村落(部落、城镇、乡里等),他们只是在村落中研究。”^[35]5. 全球化使“地方”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球村”将某一个地方性限制打破了,旅行和旅游成了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基本方式。克里福德认为,旅行文化所产生的后果是:“社区外部与内部、家里与家外、乡村与田野这些二元对立概念不断被后异域主义和反殖民主义所挑战。”^[36]6. 当代人类学对地方的学术研究已经包含了“地方性策略”,还要研究某一个地方与那个地方有着文化亲缘关系的“非地方”。^[37]某一个地方出现了原先并不属于它的异质性,“原住文化”也因为旅行、离散、人员交流、物质改善、经济互动等现象呈现前所未有的开放态势。

由于后现代主义形态造成了空前的“地方-家园共同体”主体性弱化,因此,强调和强化家园的主体性便显得尤为重要,传统人类学研究只习惯于把“地方”作为一个“他者化”对象,忽视了它作为主体的发言权。对于地方性的主体而言,它是一个地理概念,一个特定人群的“家园”生态,一个地缘族群对自己文化表达忠诚的依据,一个不能任意被“异化”的实体。是我的家园,我的遗产。因此,在如何确认地方遗产方面有两个认知点:首先,任何遗产都有一个“地方性”,它指遗产的“所在”。地方人民会将这些遗产看作是他们自己的而非其他。^[38]主观上他们不仅为之感到骄傲;客观上也通过某一个遗产确定地方人群共同体的“文化指纹”。其次,遗产在任何时候,尤其在今天会改变其变化与变迁的方向和方式;即学术界所讨论的遗产“再地方化”现象。一方面,遗产在历史的演进中其内容会发生相应的改变;另一方面,遗产的地方性在历史语境中需要重新解释和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地球村”的加速形成,任何遗产也都就成为“地球村民”的共同财富。人们会来遗产地旅游、居住,共享它的价值。遗产在这种变化与变迁中会出现明显的“他化”现象:即文化“异质性”的大量涌入,与“同质性”产生互动并对原来的文化结构产生作用。

“家园遗产”有一个“共同文化”的基础。一种意见认为,共同文化首先是指文化成为一个民族的整体生存方式,同时包括那些特殊的、有才能的人为之所做的杰出贡献。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包括作为共同文化的构成要素,——对整个共同体的批评观念以及拥有对共同体文化的“分化”和“片面

化”的文化。^[39]大致上,对“共同文化”的认识存在着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一是强调以地方为根据的“共同体”文化,另一种却强调不断分化的“非共同体”文化。^[40]笔者认为,两种观点不过是对同一历史存在的对立力量的各自表述。“共同体文化”本身包含着两种构成因素:一是指在一个共同体范围内可以被确认的、认同的价值,或“生活方式”;另一种则强调同一个价值或“生活方式”的分离力量和变迁过程。“如同共同体中原始社会的神话一样,其中的共同文化,在形成共同的社会纽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它形成了一切其他事物的基础。”^[40]我们也看到,共同文化与它的依附基础一样,是有限的、相对的和历史性的。诚如霍米·巴巴所分析的那样,它已经在传统的地方处所之中融入许多新的东西,成为一种“既非一种新的界域,亦非一种离却于过去的时间状态,它使人们在特定的社会中通过时间和空间的转换,产生出一种复合形态。这种形态包含了新的差异和认同,过去和现在,内部与外部,包容与排斥等。”^[41]

我们之所以强调“家园遗产”的概念,是因为在传统的意义上,“家”是个人世界稳定的物质中心,一个人可以放心离开和安全返回的安静的所在(可以是一个房子,一座村庄,一个地区,或者一个国家),一个人所关注和掌控的那个基本核心。^[42]它常与“愉快的记忆、亲密的关系,与父母、兄弟姐妹和自己的爱人同处所带来的那种温情和安全感联系在一起。”^[43]在这个意义上,“家”与“稳定”、“持久”、“确定性”和“永恒”基本上是同义词。^[44]人类要格外爱护和珍惜自己的家园遗产。人们以自己的“家”与“家园”为中心的时空转换实现“自我”与“世界”的分离与合作关系。海德格尔在他的《时间与存在》中有一段名言:“世界与自我并不是简单的一分为二,而是一个相互关联的实体;是一个无法彼此分开的存在结构。”^[46]如果我们从“存在”的实践原理去体认的话,人类是通过对“家”和“家园”的工具理性的实践去完成对世界的理解和能动。对于遗产研究而言,我们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不能脱离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性家园背景去认识和理解遗产;反之,遗产的人类价值也只有通过人们对自己家园的巢筑、经营、记忆与认同方可达到真正的体会和体验。个人与集体的最直接关系和最具有价值兑现的地方正是“家”。^[4]它所包含的东西和关系非常复杂:诸如时间、空间、方位、归属、居所、家庭构造、财产、环境、地方

感、“神龛化”……; 学者们干脆把家看作一种“思维”。^[47]

“家”与“家园”是一个属性相关的概念, 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互换。然二者仍有许多值得分析的地方。如果我们把“家”视为一种特殊的“物”, 我们发现, 大量的民族志材料为我们提供了以土地为人类获取基本的生活和生计来源的两种粗线条类型: 一种是随着气候和地理环境的变化而采取的迁移类型。比如早在七万五千年前, 还处于石器时代的尼安德特人, 他们面临着严重的气候变化和动植物大变迁的环境, 能够随着环境的改变成功地改变和适应其经济和文化方式。有学者认为, 可能正是由于“尼安德特人没有发展出农业和植物栽培知识, 才能在连续变化的条件下保存下来。无论大自然给予他们什么东西, 他们都能赖以生存。”^[45]人类早期狩猎和采集的经济形式是建立在不断移动的生活方式基础上。所以, 以迁徙性族群而言, 他们有“家”却无“家园”。更为普遍、更具代表性的类型当然是农业文明“家”的类型。主流观点认为, 人类在农业发明以前没有相对稳定的居所, 定居是发明农业的结果。农业文明的基础以人与土地相互“捆绑”为前提。“家”不仅基本固定, 而且具有一个范围上的“边界”规定。又由于农业是以分工协作为生产方式的人群组合的共同体社会, “家园”便自然形成。^[45]我们无意纠缠于这一假定讨论, 只想从人类社会两种原始类型确立“家/家园”的差异性和不可替代性。一个稳定的、持久性居所, 是人们情感化认同的结构性符号。

从概念到实体, “家”、“家园”不仅涉及到遗产的“主权”与“归属”的边界范畴, 还涉及到“外来者”的权力与责任的限度范围。我们格外重视“家园遗产”的作用, 根本原因是在今天的“遗产运动”中它不被重视, 不被强调。这样的情状无论在遗产学的研究上或是遗产政策的实际实施中都是如此。这应引起我们深刻的反省。我们一方面强调遗产的“地方性”, 另一方面又强调遗产属于“国家”。前者的边界是地理性的; 后者的边界是政治性的。二者在逻辑上和认知上并不重叠, 有很大的距离。在现实的实践中, 遗产的“地方性”和“族群性”经常为“民族遗产”的“官方话语”所主导、所取代。^[48]换言之, 遗产作为“人类遗产”与作为特定人群“共同体财产”之间出现了以强凌弱的情形。造成这种情状的原因, 除了政治强权外, 还涉及到一些认知分类问题, 比如遗

产和遗物等概念在“遗产运动”中模糊不清。这种分类和认识上的偏差必然会导致在强大的“公共话语”面前, “家庭(家园)遗产”转化成为“民族遗产”。^[48]它所带来的危险性是遗产被公权力“拿走”或“转交”给其他的部门、单位、组织、商业机构等, 使遗产的所有者丧失了有效地传承遗产的权利和能力。

遗产的主体、遗产的责任、遗产的传承离不开“遗产家园”的共同体。我们看到, 人类遗产与现代旅游活动和行为无法截然分开。旅游正在成为一种快速增长的全球化复杂现象, 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密切相关, 并演变成为一种“多民族交流的最大活动”。^[49]这种不同民族、不同文化间的交流常常以人类的遗产为媒介和桥梁, 人类重要的遗产景观和景点也因此成为这种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场所, 导致遗产地或者某一个遗址、纪念物等历史叙事的“再表述”事实。^[50]现代旅游对遗产的大规模接触, 迅速改变了遗产的价值和对遗产价值表现的诠释路径。遗产因此也增加了全新的展示内容, 成了现代社会再生产的“新产品”。杰米森将这种“遗产旅游”归纳为: “旅行活动涉及到诸如视觉和表演艺术, 遗产的建造、区域、景观、特殊的生活方式、价值、传统和事件等”更大范围;^[51]演变为“遗产旅游工业”。^[52]简言之, 旅游扮演了一个与遗产、保护工程、人群共同体(社区)特殊的发展模式。在这一发展模式, 遗产被当成了资本积累的介体。^[52]按照纳什的说法, 现代旅游是一种与资本、权力、社会再生产紧密结合的“帝国主义形式”。^[53]

所以, 现代旅游, 特别是针对遗产的所谓“遗产旅游”对于任何一个具有主体性的群体而言, 共同体的“家园价值”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 诸如文化民主、文化自觉、文化伦理、族群认同、主人翁意识等都会在不同人群和文化交流中显示出特别的意义。^[54]就研究而论, 文化-自然遗产是一个连续体, 新的意义会不断地被发现。当代大规模群众旅游活动加速了遗产的概念和意义的变化, 包括改变共同体的内部结构、观念价值、生产生活方式等。相关国际组织和公约把旅游可能给遗产地所带来的影响和破坏作为一项严峻的任务, 比如“纪念性建筑和遗址国际委员会”(ICOMOS)就将文化遗产、旅游投资和计划与东道主社会(社群、社区)之间的脆弱和敏感关系作为一项重要原则。^[55]我们认为, 在当前的遗产运动中, 根本问题

还是：“谁做主？”的问题。^[56]

遗产的概念、分类，遗产的认知、分析与家园遗产主体性的关系互为彼此，互相链接；它们既构成一个原生性的有机整体，也呈现出一个变异性的发展过程。在现代语境中，伴随着强势性政治话语

的作用、社会再生产的作业、商业资本主义的作祟、现代大规模旅游的作为、行政管理部门的作风……使遗产在表述与被表述、展示与被展示中呈现出复杂“自我的他性”。^[57]笔者认为，遗产的可持续性取决于遗产主体性。“我思故我在”，是为理。

参考文献：

- [1]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编. 世界遗产相关文件选编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2] R. Hewison, Heritage: An Interpretation In D. L. Uzzell, (eds)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 I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1989.
- [3] N. H. Grabum, Learning to Consume: 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 In N. A. Sayyad, (eds) Consuming Tradition, Manufacturing Heritage London: Routledge 2001.
- [4] D. Harrison, & M. Hitchcock (eds)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 Clevedon/Buffalo/Toront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 [5] N. H. Grabum, Tourism, Modernity and Nostalgia In A. S. Ahmed, & C. N. Shore (eds) The Future of Anthropology: Its Relevance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London: Athlone 1995.
- [6] J. M. Bart, Van der Aa, etc. "World Heritage as NIMBY???" In D. Harrison, & M. Hitchcock (eds)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 Clevedon/Buffalo/Toront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 [7] UNESCO. Statement on "regional histories". On WWW at 2004.
- [8] T. Winter, Landscape, Memory and Heritage: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Angkor, Cambodia In D. Harrison, & M. Hitchcock (eds)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 Clevedon/Buffalo/Toronto: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05.
- [9] 拿珠. 爱作为生态的公义——权利与责任 [A]. 王晓朝, 杨熙楠. 生态与民族 [M]. 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 [10] P. Boniface, & P. J. Fowler,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the global villa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 [11] D. L. Uzzell, (eds) Introduction: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 [12] P. Boniface, & P. J. Fowler,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the global village".
- [13] Claude - Marie Bazin,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In M. Lanfant, J. B. Allcock, and E. M. Bruner (eds) International Tourism: Identity and Chang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
- [14] J. Friedman, Being in the World: Glob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In M. Featherstone, (eds)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1990.
- [15] Claude - Marie Bazin,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1995.
- [16] N. H. Grabum, Learning to Consume: What is Heritage and When is it Tradition?.
- [17] G. Greer, Tune for the worse is just not cricket In The Mail on Sunday, 21 August . 1988.
- [18] F. Barth,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9.
- [19] M. Laenen Looking for the Future Through the Past In D. L. Uzzell, . (eds) Heritage Interpretation Vol/ I The Natural and Built Environment London & New York: Belhaven Press 1989.
- [20] E. Yaburi, The Acropolis Oxford: Berg 2001.
- [21] J. Le Goff, Histoire et Mémoire Paris?: Gallimard . 1988.
- [22] K. Day, U. Cohen, & D. Arch The Role of Culture in Designing Environments for People with Dementia In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Vol 32 , No 3. 2000.
- [23] 费孝通. 乡土社会 生育制度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98.
- [24] L. Domanico, The Invisible Landscape: Subsoil, Environment and the Italian Legislation on the Culture Heritage In Europe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Vol 2 , No 2 1999.
- [25] M. Querrien, Pour une Nouvelle Politique du Patrimoine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83.
- [26] 迈拉·沙克利. 游客管理：世界文化遗产管理案例分析 [M]. 张晓萍, 等译.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
- [27] 班纳迪克·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睿人译. 台北：时代文化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
- [28] Claude - Marie Bazin,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 [29] E. Hobsbawm, and T.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30] P. J. Fowler, Heritage: A Post - Modernist Perspective

- [31] R. Redfield. *The Little Community, and 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0.
- [32] N. Rapport, and J. Overing. *Social and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Key Concep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 [33] D. Minar, and S. Greer. *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Chicago: Aldine. 1969.
- [34] 弗格森. 人类学定位: 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 [M]. 骆建建, 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5.
- [35] C.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 [36] 克里福德. 广泛的实践: 田野、旅行与人类学训练 [A]. 古塔·弗格森. 人类学定位: 田野科学的界限与基础 [C]. 骆建建, 等译. 华夏出版社, 2005.
- [37] T. H. Eriksen, *Small Places, Large Issues*. London and Chicago: Pluto Press. 1995.
- [38] M. Featherstone (eds) *Global Cultur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and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39] R. Williams, *Common Culture*. In *Resources of Hope*,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89.
- [40] 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M]. 刘精明译. 上海: 译林出版社, 2000.
- [41] Homi K. Bhabha,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42] N. Rapport, & A. Dawson (eds) *Migrants of Identity: Perceptions of Home in a World of Movement*. Oxford/England: Berg. 1998.
- [43] M. Sarup, Foreword In T. Raja (eds) *Identity, Cultur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6.
- [44] 王苍柏, 黄绍伦. 回家的路: 关于全球化时代移民与家园关系的思考 [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2006, (4).
- [45] 利普斯. 事物的起源 [M]. 汪宁生译. 敦煌文艺出版社, 1982.
- [46] M.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Oxford: Blackwell. 1962.
- [47] P. Boniface, & Fowler, P. J. *Heritage and Tourism in "the global village"*.
- [48] Claude - Marie Bazin, *Industrial Heritage in the Tourism Process in France*.
- [49] L. Borley. *Cultural Diversity in a Changing Europe*. In J. Fladmark (eds) *Cultural Tourism*. London: Donhead Publishing Ltd. 1994.
- [50] T. Winter. *Landscape, Memory and Heritage: New Year Celebration at Angkor, Cambodia*.
- [51] W. Jamieson. *Cultural Heritage Tourism Planning and Development: Defining the Field and Its Challenges*. In *APT Bulletin: The Journal of Preservation Technology*. XX-IX (3 - 4). 1998.
- [52] R. F. Daher. *Dismantling a community's heritage*. In M. Robinson etc (eds) *Tourism and Heritage Relationships: Global, National and Local Perspectives*. Gateshead: Athenaem Press. 2000.
- [53] 纳什. 作为一种帝国主义形式的旅游 [A]. 载瓦伦·L·史密斯. 东道主与游客: 旅游人类学研究 [C]. 张晓萍, 等译.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02.
- [54] G. L. Evans & R. Cleverdon, *Far Trade in Tourism -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 marketing tool?* In G. Richards, & D. Hall (eds) *Tourism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y Development*. London: Routledge. 2000.
- [55] R. F. Daher. *Dismantling a community's heritage*.
- [56] D. Harrison, & M. Hitchcock (eds) *The Politics of World Heritage*.
- [57] 流心. 自我的他性 [M]. 常姝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The Politics of Heritage: The Relation between Expression and the Expressed in the Modern Context

PENG Zhao - rong

(Department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Heritage as a special human "property" has a complicated relation with a specific society, history, nature, culture and expressive ways. There have emerged numerous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terms of its understanding and interpretation. Under the great influence of political discourse in the present movement of "heritage fever", politics has stamped its marks on the heritage's expression and its expressed ways, a clear "inversion".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heritage, the "aphasia" and even "degradation" of the subjectivity of heritage all demand clarification. This is related not only to our correct understanding and reasonable selection of heritage as well as the autonomy and importance of reconstructing the homeland of mankind but also to the results of the sustainable heritag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worked out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Key words: heritage; political discourse; subjectivity of expression; understanding; homeland

(责任编辑 王东昕)